

舞台焦點

撰文：張綺霞 etlacheung@hkej.com
攝影：陳樂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身份近年成為港人常談論的議題，膚色與血統為天生，身份卻是後天的文化認同根據，需要自行尋找和建構，從梳理歷史出發，定義當下的存在位置，再思考未來路向。

人窮一生追問我是誰，或許最後都沒有答案，然而對美籍華裔劇作家黃哲倫 (David Henry Hwang) 來說，提問本身已有其意義。

他的劇作總是與身份及文化的衝突有關，就算是為迪士尼創作百老匯音樂劇《泰山》也在不斷問「我是誰」。他笑言：「身份問題是世界性的，無論是在中華與美國文化之間，還是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。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終極答案，但仍要不斷問下去，因為身份總是不斷改變，定義現在的自己，才能找到與過去及未來的差別，才有繼續改變的動力。」



黃哲倫在劇本寫作外，也致力推動中美兩方的劇本寫作交流。

黃哲倫小檔案

英文名：David Henry Hwang
出生年份：1957
學歷：史丹福大學英語系、耶魯大學戲劇系
代表作：《蝴蝶君》、《黃臉孔》、《中式英語》

百老匯劇作家黃哲倫 永恒身份疑問

這次黃哲倫是應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邀請來港，以《跨界劇本寫作》為題演講，介紹自己有份籌辦的中美劇作家交流計劃。計劃早在2013年開始，邀請中港台三地的劇作家到紐約去，把他們的劇作翻譯成英文並舉辦讀劇工作坊。「希望可以發展成長期項目，同時也把美國劇作家帶到華語地區。」他們另外也邀請了賴聲川到美國共同創作英語歌劇《紅樓夢》，將於9月首演。

在與華語劇作家的交流中，他發現原來「中華」也是多元的，海外華人、台灣華人、香港華人在內地來自上海及北京的華人，對「中華」都有不同詮釋。「如何界定華人身份，每個人都有掙扎，我們都找出與傳統的關係，了解過去對我們現在的影響。唯一相同的是，我們都是不同的。(笑)」

早摘東尼獎

美國人、華人乃至菲律賓華僑後代的身份，在他身上同樣起作用。「我覺得如今時代，人們普遍都帶有多於一種身份，是混雜的。」他在五十年代出生，六十年代成長，當時美國人對身份想像單一，種族歧視嚴重，從小父母希望黃哲倫去掉華人身份融入美國文化，而他也努力學習主流作

風，以免被人劃為亞洲人與華人。「我小時候甚至不知道農曆新年是什麼，交了個華裔女朋友，她的家為此慶祝，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上了大學，他要離家讀書，開始了劇本寫作。在向內尋找靈感的過程中，才開始挖掘身份。「什麼是華人，什麼是亞洲人，都讓我思考很多。」於是他從大量閱讀中了解中華文化歷史，又學普通話，並以身份掙扎為題材創作劇本。雖然當時社會歧視仍嚴重，然而隨着八十年代中國逐漸開放，美國人也對華人文化愈感興趣，他的劇作得到不少關注。

在22歲還未畢業時，他的第一個劇作《新移民》(FOB) 就獲重賞，在百老匯上演。30歲那年，他根據中國間諜時佩瑛扮女裝與法人結婚偷取情報的故事，寫成《蝴蝶君》(M. Butterfly)，取得空前成功，令他摘下劇作界最高榮譽的東尼獎，成為首位奪得此獎的華裔編劇。

世界性議題

在白人主導的劇壇，他幸運地成為例外，沒有遇上太多困難就被看見。「但這同時也是事業上的限制。每個人都把我當成是一個種族劇作家，只會寫美國華人有關的事。」成功後是漫長的重新自我定義，此後10年，他努力走出《蝴蝶君》影子，後來想通，劇作是自己的一部分，為何要割離？「其實有一個作品很多人都能認識是幸運的事情」。於是他延續身份掙扎的題材，寫下尋根之作《金童子》(Golden Child)，又將自己面對種族歧視的經歷化身喜劇《黃面佬》(Yellow Face)。近年多次回內地工作的他，又以中美文化衝突為題，寫下《中式英語》(Chinglish)，作品都引起不少話題。

除了美國，他的作品在亞洲地區多次上演。他笑言，自己總是寫身份掙扎，因此在文化衝突劇烈、有身份認同危機的地區如香港、新加坡等，觀眾總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。「《黃面佬》在墨西哥上演，觀眾竟也能理解和喜歡。而在日本最受歡迎的是《蝴蝶君》，原來他們對西方人如何看亞洲非常好奇。你總無法預計觀眾的反應。」

從美國華人身份開始，到國際關係的



他的子女(左二、三)都是混血兒，與他一樣面對身份衝突與掙扎，右一是他太太。(Lia Chang 圖片)

探索，如今他又兜回了原點，想以美國社會文化為題材創作。「我以為一切與多元文化有關的議題，即美國是由不同文化及身份構成這件事，在好早以前已經達到共識。但如今好像又不是那一回事，特朗普上場，以白人男性為主的群體多次表達對少數族裔的憤怒，讓人發現原來這議題仍未解決。美國對我來說又變得有趣了。」

種族衝突在世界各地日益加劇，如美國近日因種族歧視引發殺警事件，隨着各國文化愈來愈頻繁，民粹、種族歧視、威權主義等也有愈來愈多信眾，他相信未來世界仍能向更好的方向發展。「只是未來10年的環境可能艱難些，而戲劇與藝術，正在這環境中讓人反思自身和身處的世界，「我不相信一個演出能改變人心什麼的，那是我寫不來的東西。但我覺得劇場是個凝聚了各種議題的空間，把它們放在舞台上，要人好好思考。」

平等路漫長

近年百老匯的劇種也有更多元的趨勢，去年音樂劇《漢密爾頓》(Hamilton) 破格地起用多種膚色的演員，取得巨大成功，「在你把好东西擺出前，觀眾未必知道自己要什麼。」但他仍覺得劇場在種族平等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並引述統計數字，指出少數族裔的演員佔紐約總演出人數仍不足三成。我們的觀眾在不斷改變，然而劇

場仍未取得上進度。」

到現在他的中文已忘得七七八八，創作就算與中文有關，也是先寫英文再請人翻譯。但他自言，在某方面上，父母還是默默地將華人文化思想灌輸給他。

「例如我要很難才能提出否定意見。在人際關係上，華人總是喜歡少對抗、多和諧。然而在美國文化中，對抗這舉動總是獲得更多尊重，就算你在會議中跟別人爭吵，過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，是兩種不同相處方式。」他笑言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到了四五十歲左右，他才真正能表達異議乃至憤怒情緒。

他的一子一女都是混血兒，兒子已經20歲，希望成為足球員，問到可會想兒子繼承衣鉢？他哈哈一笑，說自己家族沒有這傳統：「他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吧，我也沒有跟我爸爸的(其父為美國遠東國民銀行創辦人)。我爺爺不聽我太爺的，自己跑了去上海，我的爸爸不聽我爺爺的，自己跑了去美國，我也不願爸爸反對成為劇作家，所以我兒子有這想法很自然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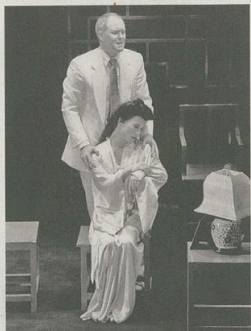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孩子都如他那樣，經歷身份認同的掙扎。「我兒子的臉孔很亞洲，卻認為自己是華人，然而身邊的人都不覺得，臉孔很亞洲的女兒則相反。他們都面對着各種矛盾，受各種亞洲文化感染，對自己的種族也很有意識。紐約相對來說環境較自由，我希望他們這一代更能活出自己。」



近年他以中美文化衝突為題寫下《中式英語》(Chinglish)，作品在美國及其他地方均有巡演。(Lia Chang 圖片)



黃哲倫的劇作總是與身份與文化的衝突有關，在他來說，「我是誰」的問題永遠沒有一個終極答案。



《蝴蝶君》(M. Butterfly) 取得空前的成功，令他在1988年摘下劇作界最高榮譽的東尼獎。(Joan Marcus 圖片)